

師苑教育叢書 65

比較教育理論與方法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原著主編：Jürgen schriewer/Brian Holmes

中譯主編：楊國賜・楊深坑



師大書苑發行

比較教育理論與方法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原著主編：Jürgen schriewer/Brian Holmes

中譯主編：楊國賜・楊深坑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發行

比較教育理論與方法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主編者：楊國賜・楊深坑

發行人：陳淑娟

負責人：白文正

出版・發行：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47號11樓之2

電話：(02)3973030・(02)3975050

郵撥：0138616-8

經銷處：師苑（圖書出版部）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29-1號

（師大綜合大樓壹樓）

電話：(02)3927111・(02)3941756

傳真：(02)3913552

排版印刷：創建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理街

電話：(02)3068268

出版登記：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2190號

初版：中華民國81年10月

定價：新台幣貳佰壹拾元整

中文版序

Preface to the Chinese Editi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ducation, in historical terms, has represented only one aspect of a much wider intellectual project. This project came into being at the end of the 18th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In essence, it corresponded to the idea of systematically using comparative investigations in order to enhance processes both of the discipline formation and of the scientificity of quite an array of different fields of study, ranging from Anatomy through Linguistics to Law, Religion, and, last but not least, Education. The idea of developing particular branches of comparative study was, in other words, closely interlinked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distinctively modern concept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Subsequent developments, however, taken by Comparative Education as an institutionalized field of study have largely departed from ideas of this kind. In contrast to disciplines such as Linguistics or Sociology, in Education the relations of interaction, implied by the original project, between theory building and cross-

cultural research have not actually been effective, let alone continuous. Rather, Comparative Education has always been pervaded by contrasting goals, divergent orientations, contending paradigms, and scarcely compatible methodological options. More recent approaches have even come to eclipse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stinct national or cultural units by investigating into the international nets of relations of dependency and interdependency or by the study of the world-system seen as one single unit of analysis.

Consequently, analyses seeking to overcome the continuous-gap, apparently characteristic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promise and performance or, as a critic once put it, between Phoenix and Dodo might no longer confine themselves to merely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Rather, they will gain in depth by investigating the complex interplay between the various components — such as social frames of reference, mental attitudes, philosoph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premises, theoretical orientations, methodological rules, and substantive studies — the differing patterns of which make up the field's divergent paradigms, *Denkstile*, or strands of research. This not merely involves performing the shift from methodological prescription to socio-historical description which is a characteristic feature of recent changes in the general metascientific discourse. This means also re-introducing comparative examination into the metascientific analysis of Com-

parative Education itself. It is in this sense that the essays assembled in this book, while arguing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focusing on diverse issues, are designed to contribute to 'a more reflective style' of conceiving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ducation. "A more reflective comparative education — a reviewer of the book's original English edition maintained — becomes a way toward critical analysis of, and movement past, ideological, theoretical, epistemological, and ontological contradictions."

Jürgen Schriewer

原 序

數十年來，方法論問題一直為比較教育學者所特別關心。比較教育評論以及書目均証實有相當多知識界的努力投注於建立這個研究領域的目的和用處、界定其特質及其與其它學科的關係以及澄清其方法論的規則及特殊過程。這無疑的和下列事實有關：和國內性的研究比較起來，跨國比較或文化與文化之間的比較需要更高程度的方法論上之問題覺知以及方法論的複雜精緻化。進一步而言，知識社會學中的理論發展使人注意到這個爭論的另外一個同時也是更為一般性的理由，因為這些理論發展均將社會活動詮釋為自我反省的。因而，對一個實質比較使用方法之考慮只是在相當普遍的現象劃分出一個極為特殊的個案而已。比較教育中持續的方法論之考慮及其相應的討論也因此一方面被認為理所當然，另一方面則又是向來甚少被包括進本學科的工作。

在此觀點下，本書的作者與編者，並不認為需要為其共同努力找尋理由來支持，儘管相關的文獻已經相當的多。他們毋寧說只是將其個別的論文置諸一個由一系列的理論建議和批判性評價、方法論途徑及後來分析等所構作而成的寬廣連續體中。在這樣做時，他們還有另一層考慮。一九六〇年代以來，正由於比較教育學者已經可以由來自幾乎社會科學各領域中的廣大範圍的創新探究途徑、動力與技術得到益處，因而這個領域中也出現了一系列不斷精心發展之方法論教科書之出版，且進而廣佈世界各地。因此，審慎檢討比較教育在其當前的實踐工作中如何採用、應用或拒絕這些建議，似乎是相當適當的。本

書所輯各文悉為規約性的考慮比較教育應該是什麼，這些考慮大部份為這個領域中流行的導向和實際結果之描述分析的努力所平衡。特別要強調的是那些促使這個領域之不同傳統、潮流、與典範成形的各種知識論先決假設的整體、隱含的世界觀。社會理論與方法論選擇及不同類型探究。最後，這種對比較教育重新檢討的探究途徑，還有一個事實須加以強調，即：本書各文分別由英國、法國、德國、拉丁美洲與美國學者所撰寫，對此領域之探討亦由不同理論觀點，而不同理論觀點則植根於不同的學術傳統、知識導向與社會文化環境。

比較教育中後設科學論辯，從方法論的規約到社會歷史的描述之間的轉移在本書第一部份各文有特別明白的說明。從科學史和知識社會學借用概念工具，他們發展並運用適合於分析比較教育歷史發展與現狀的理論架構。有關比較教育研究對系統的理论建構、歷史說明或政策導向之預測等的貢獻之問題則在第二部份各文討論。這些問題之探討一方面和不同的哲學、知識論和文化的假設有關係，另一方面則又涉及了理論在實際比較研究的應用。最後，第三部份的論文為方法論增加了不尋常的層面在於他們是在更寬廣的教育(或教育學 *educology*)脈絡下(也就是把教育學作涵蓋所有的基礎學科脈絡下)，來為比較教育的學科地位、理論功能、可欲的研究進程及潛在的結果進行定位的工作。

把這本書的各文集彙在一起的念頭，源自於一九八四年在巴黎舉行的第五屆世界比較教育會議的討論，當時本書作者大都為「比較教育理論與方法」委員會的成員。假使那一次的會議激發了本書作者預備了呈現在此的第一次論文草稿，幾乎所有的論文都完全修正過，並相當幅度的擴增，有些甚至與編者磋商，而在本書去年行將付梓時完全的重新改寫。更甚者，這些論文也成為爾後一九八七年里約熱內盧

第六屆世界比較教育會議下後續委員會熱烈討論的題材。因此，本書見證了國際會議所給予的激勵。本書也期望依序能刺激實質的研究，導引對比較教育相關的理論、比較教育的地位作更進一步的分析，鼓勵對社會研究中的這個領域的發展與成就進行研究。

沒有作者及其他同道與法蘭克福歌德大學普通教育研究所同事等極具建設性的合作的話，本書的完成殊不可能。對他們我謹致極大的謝意。Michel Debeauvais 為世界比較教育學會聯合會主席時一再的鼓勵我把本書編成。Brian Holmes 曾策劃巴黎會議，也給我甚有價值的建議。他和 Raymond Ryba, Nelson Wattie, Christian Ehrhardt, Bouthena Cheriot 等人並為原為德、法文的各文準備或評閱英文翻譯。最重要的是，我最誠摯的謝意要獻給我兩位親愛的合作者 Edwin Keiner 和 Christian Ehrhardt。他們不計時間與努力，編輯本書各文，一再校讀、改正、安排版面，同時確保文字處理軟體的順利運行，使得本書在付印之前的最終形式能夠記錄下來。

Jürgen Schriewer
Frankfurt, Spring 1988

編譯弁言

教育研究之邁向經驗科學化早在一七八〇年特拉普（ E. Ch. Trapp ）刊佈「教育學探究」（ Versuch einer Pädagogik ），首肇其端。比較教育也在一百七十五年前，朱利安（ Marc-Antoine Julien ）出版的「比較教育導論」（ Esquisse et Vues Préliminaires d'un Ouvrage sur l'Education Comparée, 1817 ）開啓了實徵科學研究的先河。然則，時至今日，不僅比較教育，即就整個教育研究領域而言，其科學性猶有不少爭論有待解決。正如本書編者之一 Jürgen Schriewer 所云，比較教育面臨著學科認同（ disciplinary identity ）上的危機。事實上，這種危機不僅見諸比較教育，也見諸整個教育學領域。

危機的克服有待於在理論與方法上作深度的後設科學探究，才能使教育研究，或特殊而言，比較教育研究建立在穩固的客觀性基礎上。一九八四年第五屆世界比較教育會議在巴黎召開，以 B. Holmes, E. Epstein 和 J. Schriewer 爲首的一羣比較教育學者，即深感這個問題的深入探討對於比較教育研究的發展相當重要，因而組成「理論與理論變遷小組」，試圖對比較教育方法論的各層面作有系統的研討。本書所輯各文即是這個小組的部份工作成果。這些文章又在一九八七年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辦的第六屆世界比較教育會議詳加討論，而於一九八八年由法蘭克福名出版商 Peter Lang 出版，英文版已發行三版。日文版和西班牙文版也已刊佈。

本書中文編者於一九八九年參加加拿大蒙特婁舉行的第七屆世界

比較教育會議，即與「理論與理論變遷小組」的成員有所討論。俟後趁參加第十四屆歐洲比較教育會議之便，與本書編者 B. Holmes 和 J. Schriewer 更有深入的討論，深覺本書所探討的重要主題，如比較教育研究之不同傳統、潮流與典範的後設科學分析、社會科學理論與觀念之知識論預設及其在比較教育上的運用之探討以及比較教育在整個知識體系的定位問題之討論等，不僅對比較教育研究相當重，事實上，這些主題的深入研討，對於整個教育學學術造型之形成，也有極深刻的意義。因而，商得原編者同意，邀約同道，將之譯為中文，希能為我教育學界提供比較教育方法論更多不同的思考方向，激勵更多更為深入的比較教育學術著作出現。

本書原編者對於中文版的出版，反應甚為熱烈，不僅提供甚多出版意見，也在百忙之中專為中文版撰寫序文，謹此致謝。本書各文的中譯者，字斟句酌，對其譯事之嚴謹，在此表示敬意，也對其容忍本書一再延遲出版，表示歉意與謝意。最後，師大書苑白文正先生慨允本書之出版，也一併於此申致謝悃。

楊國賜
楊深坑 謹識

民國八十一年九月

目 錄

中文版序

原 序

編譯弁言

第一部份 變遷中的比較教育後設科學論辯

第一章 比較教育中「比較」之疑義

Erwin H. Epstein 著 潘慧玲 譯 1

第二章 比較方法和外在化的需求：方法論規準和社會學概念

Jürgen Schriewer 著 楊深坑 譯 25

第二部份 比較教育中觀念與理論在分析上的用處

第三章 泛文化比較中的概念問題

Le Thanh Khoi 著 周愚文 譯 95

第四章 因果論、決定論與比較教育

Brian Holmes 著 楊國賜 譯 123

第五章 比較教育中的遊戲理論：展望與命題

David A. Turner 著 周愚文 譯 147

第六章 依賴理論在比較教育的應用及其課題

Harold J. Noah Max A. Eckstein 著 蔡清華 譯 167

第三部份 比較教育的學術地位

第七章 比較教育：何種知識？

Carlos E. Olivera 著 陳伯璋・李錦旭 譯 197

第八章 文化與社會化：被遺忘的傳統與比較教育新的向度

Ludwig Liegle 著 王文科 譯 227

人名索引 271

原著者簡介 277

中譯者簡介 278

第一章 比較教育中「比較」之疑義

Erwin H. Epstein 著

潘 慧 玲 譯

對於比較教育之父 Marc-Antoine Jullien 而言，沒有其他事物較「比較」一詞更為清晰(註一)。「比較」指涉將不同國家的教育特色與方法做對照。在其當今知名的著作「Esquisse」中，Jullien 具體描述適當的比較方法論，包括使用標準問卷以蒐集資料，以及將研究發現置入表格以使各國教育相異之處一目瞭然。當考慮地區特殊性與心態差異性(differences in mentality)之後，這些表格便呈現了一些有利於移殖他國的要素。Jullien 的終極目標與其方法一樣明確，即「演繹出真正原則與明確規則，以使教育成為幾近於實證之科學」(註二)。

Jullien 於一百七十年前即將實證主義確定為比較教育之主要傳統，在所有比較學者中，以具有認識論觀點者所提之立場最為明確。事實上一些現代的實證主義者甚至宣稱，只有透過比較，人類行為才能以真正的科學方式做研究；如果沒有透過跨國的檢驗，便無法通透地了解教育的本質。Noah 與 Eckstein 以為「比較教育……企圖使用跨國的資料以檢驗教育與社會的關係，教學實際與學習成果的關係等議題」(註三)。對於 Farrell 而言，「沒有任何一種推論性的教育科學研究不是教育的比較研究」(註四)。Merritt 與 Coombs 則以為「沒有系統性的跨制度比較，我們便無法發展出所需的理論；沒

有這些理論，即使是在一個國家的教育制度裡，我們也無法解釋任何事情」(註五)。而對於 Le Thành Khoi 而言：

「真正的一般教育理論乃奠基於對不同類型的歷史文明做深入的研究，探討教育與社會之相互關係……這項工作的目標是形成律則(laws)，而這律則將不具有那些在實驗科學中所產生律則的效度，但它在時空上卻呈現了相對的恆常性關係。

比較教育必然會發展出這樣的『律則』。它不僅是單一學科(discipline)；它是一研究領域涵蓋了可以了解與詮釋教育的所有學科……『比較』容許我們去澄清與發展類型學(typologies)，並在既定之情況下進行『間接的實驗』」(註六)。

所有上述的說法均明示了比較之義：一種跨國研究的方法，以發現教育與社會面向間恆常的關係，如 Anderson 所說的，以便「去說明抽離時間與(演進)階段概念的過程」(註七)。上述之作者亦明瞭比較之重要性：沒有比較，便無法完全地理解教育，比較教育必成為研究學校之礎石。最後上述作者亦了解教育應如何地研究：只有對教育的實證性陳述(empirical statements)方為科學的；只有科學的陳述才是有意義的。亦即一個命題要具有意義，原則上必需是可以被檢驗或證實的，如果命題要成其為真，必需要通過經驗的檢證(experiential test)。

無論如何，在比較教育領域裡一直存在著對於實證主義立場的嚴重挑戰。就其本身而言，這不足為怪，因為一個成長的領域通常會呈現異議。就如物理學，對於微中子(neutrinos)之存在便有不相容的假設，這些假設並非由於實驗之證據——因為中子流是無法偵測的——不同之假設乃由於不同之理論傳統提供不同之解釋情境(註

八)。當然，由不同學科訓練所提供之相異解釋情境，便形成對於同一現象之不同界說。Benton 在說明恐龍絕跡時，就提到不同之解釋理由：

「天文學家與地球物理學者認為是小行星或彗星所造成；大氣科學家則以酸雨為其原因；眼科醫師以為是白內障視盲所致；生物學家認為是生物鹼中毒引起；而營養師則以為纖維與自然油脂的減少，導致恐龍普遍地便秘，最後導致絕跡。」（註九）

然而比較教育此一研究領域的爭論與上述情形不同，比較教育中所存在的不同立場，其所代表的不僅是對於現象的不同詮釋方式而已，其更危及了比較教育本身之存在性。一位比較學者於最近說道：

「在大量閱讀比較教育的本質與方法的相關文獻後，我得到一個不可避免的結論，那就是根本沒有比較教育這樣的事物，亦即比較教育無法成為一個研究領域。」（註十）

我在比較與國際教育學會(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所發表的會長演說中，曾提及相對立的取向對於比較教育構成威脅，因為這些取向不管在認識論或意識型態上均有不可妥協的差異性存在（註十一）。在本文中，我希望就上述論點做更深入的探討，重點在於分析相對主義(relativism)不僅對於實證主義，更對於比較教育本身要成為一領域構成挑戰。在此，我亦想澄清早先所提出的一些觀念，特別是呈現從前我所提及的，有一些比較的方法如何無法歸入實證主義或相對主義之傳統。

一、相對主義之衝擊

我相信在比較教育中有兩股明顯的相對主義派別，第一派存在的歷史與實證主義幾乎一樣長，而且特別是在歐洲獲得相當程度的接納，此派我稱之為文化相對主義(cultural relativism)，它在比較教育中通常與類似「國民性格」的概念伴隨出現。雖然文化相對主義與實證主義無法相容，它卻提供了比較教育另一可行的方法。第二個派別於晚近才出現，它不僅與實證主義取向相對立，且在本質上與任何有意義的「比較」概念不相容，此派即為現象學。在本文中，我將增添現象學(或俗民方法論)的介紹(註十二)，以下將依序呈現上述比較教育的兩大取向。

二、文化相對主義

直接相對於實證科學的單一詮釋(nomothetic explanations)所呈顯出來的是文化相對主義的表意詮釋(idiographic explanations)。單一詮釋是去發現基本的趨勢與類型以說明行動或事件的種類；表意詮釋則是去檢驗不同事件所存在的特殊情境。文化相對主義與人類專家 Franz Boas, Ruth Benedict 與 Melville Herskovits 有關，其立場是「所有評估均與某種標準有關，而這些標準源自於文化」(註十三)。提出「文化相對論」一詞的 Herskovits 憎惡對於文化做概論，其對於所謂的行爲普遍性具有強烈的懷疑。只有文化的限制性與形塑性特徵是舉世皆然的，其他即使是顏色、形狀、時間與空間的知覺、味覺的生理機能以及對於痛的反應，也都全由文化或某些特殊社會關係所形塑(註十四)。Benedict 主張全球公認的異常行爲並不存在；有些文化即將完全正常之行爲視為異常：